

# 政治理想主義下的功利計算

## ——1949年前後中國知識份子的抉擇與生存

• 王 英

**摘要：**本文研究1949年政權轉移前後知識份子的命運、抉擇和深層的精神世界，試圖探討個體生命和社會環境之間的複雜關係，觀察那些隱秘堅固的社會組織機構和政治態勢對人的塑造和改變，同時反觀個體的選擇如何影響和形塑了新時代的政治文化。本文嘗試將研究對象從上層精英轉化到普通知識份子，特別注重探訪普通知識份子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通過個案比較研究，對照文本材料和口述歷史，溝通精英和下層，力圖展示知識份子政治理想主義和現實功利計算如何交織在一起的特殊形態，理想和現實之間的脫節和緊張成為新政權最基本的悖論。本文揭示出知識份子對權力的精心計算如何導致了虛偽和偽飾在這一群體中的瀰漫，它不但構建了一種獨特的意識形態表演氛圍，也削弱了政治文化的純粹性和一致性，並侵蝕了知識份子群體本身的日常生活，尤其是精神追求。

**關鍵詞：**知識份子 政治理想 功利計算 建國初期 政治文化

### 一 引言

1949年，中國大陸政權易手，無數人面臨命運抉擇，知識份子自不例外。知識份子與共產黨政權的關係是理解當代中國的一個重要切入點。谷梅(Merle Goldman)等人的研究把中國知識份子分為四類，即自由知識份子、自由政治支持者、激進知識份子和激進政治支持者，並考察了不同類型的知識份子和國家權力之間複雜的合作和對抗關係<sup>①</sup>。也有一些研究專門討論對國家和意識形態相當忠誠的體制內高級知識份子，考察其生活和思想，分析其在新政治文化塑造中所扮演的角色<sup>②</sup>。另有研究表明，中共對知識份子的任

用過份考慮其政治忠誠而忽略其專業技術，這種對意識形態的強調導致了組織機構理性化程度不足，嚴重削弱了國家機器的效能<sup>③</sup>。

中文文獻中也有大量知識份子和共產黨政權關係的研究。謝泳、陳徒手、于風政、傅國湧、許紀霖、楊奎松等人的研究提供了細緻的歷史史料和生動的歷史敘事<sup>④</sup>，這些研究都大大豐富了我們對建國後知識份子處境的理解。

相對而言，現有的研究較多關注上層精英，而缺少對普通知識份子日常生活和心靈世界的「深描」。英國歷史學家斯通 (Lawrence Stone) 曾經指出，新史學幾乎毫無例外都是在關心窮人及默默無聞者的生活、感情以及行為，而非大人物或有權者<sup>⑤</sup>。本文也將延續新史學的研究路徑，更加關注普通知識份子在大時代的輾轉沉浮。這些被忽略的人和事，在更幽微處傳達出歷史信息，知識份子的人生際遇透視出當代中國政治文化的複雜面向。

法國人類學家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曾將人類學的深入訪談應用到本土文化的研究之中，研究當代社會中移民、工人、中學生、老人、臨時工等一個個普通人生活中的苦難，力圖發現個體遭遇痛苦和社會結構變遷之間的互動<sup>⑥</sup>。本文也嘗試引入這種方法，以日記、回憶錄、報刊、詩文、傳記等文字材料與通過訪談獲得的口述史料，相互補充，相互印證，觀察建國初期知識份子複雜多樣的選擇和心靈世界。

對建國初期的知識份子而言，介入新中國政治的方式差異巨大，不同的際遇和選擇導致了迥然不同的人生道路。甚麼人在甚麼意義上使用或利用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對於他們的生活來說意味着甚麼？革命思想和其他思想如何糾纏雜陳、彼此衝突而又微妙並存？個人際遇和時代潮流之間關係如何？怎樣影響了當代政治文化的形塑？當代中國知識份子文化最隱蔽的特點是甚麼？以下筆者希望通過個案的梳理和比較研究，對上述問題稍作回答。

## 二 「左翼青年」：理想與生存

本文講述的第一個故事，是民國時期信奉自由民主的青年如何走上共產黨革命的道路<sup>⑦</sup>。訪談對象林宏園1927年2月出生於福建省福州市一個普通教師家庭。十六歲時，他進入當地著名的教會學校——英華中學就讀。當時英華校長留美出身，治校開明，校風自由。耳濡目染，林宏園在平靜校園裏，成長為一個自由民主主義者，其對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共產黨的了解，僅止於美國記者兼作家斯諾 (Edgar Snow) 《西行漫記》 (*Red Star over China*) 中那些浪漫的描述。林在談到這一時期的思想狀況時形容<sup>⑧</sup>：

我們學校自由民主的風氣很濃，很多老師都是留學回來的，我到現在都保持着這樣的底色，就是信奉自由民主。當時不了解馬克思主義，也沒讀過毛澤東寫的書，但看過斯諾寫的《西行漫記》，斯諾的書很流行，我

當時覺得有那麼一群人，為了新中國而奮鬥，很好奇，也被他們的理想主義精神感動。

1946年夏，林宏園和幾個朋友一起到上海參加大學入學考試。他先以第一名的成績被暨南大學新聞系錄取，復考上北京大學政治系先修班。面臨選擇的困惑，林寫信給他崇拜的文學家沈從文求教<sup>⑨</sup>：

我從很年輕時就喜歡沈從文的書，讀了他所有的作品，寫了很多筆記，當時就想試一試，給他寫信求教。沒想到沈從文還真的回信了，他用毛筆寫的一手工整的蠅頭小楷，建議說「北方有更為廣闊的世界，可以闖出不同景象的人生」。

因此，林宏園毅然北上。進入北大先修班不久，林的同鄉同學沈崇便出了一件大事。在1946年耶誕節的上午，沈崇還向林歸還了幾元借款，晚上便發生了震動各界的美軍強姦沈崇案。林也捲入了這場歷史洪流<sup>⑩</sup>：

北京的各大報紙在12月26日，幾乎全都報導了這件事情。大家讀了報紙後都非常憤慨，我們整個先修班同學在北大圖書館聚會，討論罷課遊行。當時同學中間意見紛紛，很多人都說，我們只是來讀書的，罷課遊行對自己沒有甚麼好處，對沈崇也沒甚麼幫助，不想去。我是支持罷課遊行的，我當時在北大圖書館發表演說，跳上圖書館的大桌子，站在一群人當中，激動地對大家說，全世界的海洋都不能讓一艘船沉沒，但是船自己要是有一個洞就會沉沒，我們就好像是一條船，絕不能內部分裂。

根據美國學者胡素珊 (Suzanne Pepper) 的研究，1946年底「沈崇事件」的虛實真偽晦暗難明。當時，北大訓導長陳雪屏質疑沈崇的學籍，一度謠言四起，有的說她是共產黨特務，被指派來引誘美國海軍陸戰隊隊員，以製造爭端。這一事件迅速激起了全國性的反美運動，天津、上海、廣州、南京、昆明，甚至遙遠的台北，都出現了示威遊行。諸多市民團體，包括婦女和商人團體，都出面支持學生運動<sup>⑪</sup>。林宏園和他的同學本着純樸的愛國之心捲入這場運動，無意間成為中共支持的反美浪潮的一部分<sup>⑫</sup>。

1947年春天之後，國統區經濟瀕臨崩潰，國民黨的腐敗和投機惡化了普通民眾的生活，這一切引起了學生和民眾廣泛的抗議。面對民眾反抗，國民政府開始強力鎮壓。儘管中共通過學潮和其他抗議活動，使老百姓更加離心離德，但國民政府的鎮壓能力不能低估<sup>⑬</sup>。1947年春夏之間的「反飢餓」、「反內戰」運動，導致國民黨當局和學生關係進一步緊張和惡化。在5月20日後的兩周內，報紙連篇累牘刊登當局毆打、強行逮捕和綁架學生的相關報導。學生領袖，尤其是學生自治聯合會負責人，成了政府彈壓的主要目標。學生領



1947年的「反飢餓」、「反內戰」運動，導致國民黨當局和學生關係進一步緊張和惡化。(資料圖片)

袖、積極份子以及有「共黨份子」嫌疑者都上了黑名單，這些學生不是在校外被抓走，便是夜間在校舍遭到襲擊時被帶走。軍警包圍封鎖某一所學校時，學生告密者或安插在校內的特務會帶領搜查隊搜遍寢室和牀鋪<sup>⑭</sup>。時局的惡化在年輕的林宏園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記<sup>⑮</sup>：

經常有同學被抓走，有時候半夜裏有警察到學校來搜查，鬧得人心惶惶的。而且我們吃不飽，生活非常困難。局勢很亂，大家也沒多少心思讀書，當時的感覺是對國民黨失望，這真是一個專制的政府，到處鎮壓人民。

不過，更為觸動林宏園的則是他的同宿舍好友離開北大投奔了解放區<sup>⑯</sup>：

我在先修班裏認識的一個非常要好的朋友，他叫楚莊，是當時著名民主人士楚圖南的兒子。我們碰巧被分到同一個宿舍，經常在宿舍聊天到深夜，很快成了無話不談的摯友。楚莊常常跟我說，他想去解放區參加革命。1947年2月，我陪着他一起去找葉劍英。葉劍英見到是老朋友的兒子來了，和藹地對我們說，你們想去解放區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不過解放區現在需要工程技術人員，你們學文科的最好留在北京，壯大北京的學生運動。於是我們倆只好走了，在王府井繞了一圈，吃了一頓混沌宵夜，晃晃悠悠地走回了北大。但是兩個月以後，他沒有告訴任何人，也沒有經過甚麼手續，就投奔了解放區。他走的時候還跟我說，現在應該戴上新時代的革命帽，不要再迷戀甚麼學士帽，沒甚麼價值，這些都對我觸動很大。

幾個月後林宏園也放棄學業，悄悄前往中共晉冀魯豫解放區，進入山西省長治市的北方大學外語系學習，曾陪同美國記者韓丁(William Hinton)參觀郊區土地改革<sup>①</sup>。林因此感受到中共和普通農民之間的密切聯繫，對「革命」也有了實際印象。1948年7月，林轉為華北大學社會科學部的研究生，成為「革命陣營」裏的一員年輕的幹將。

林宏園的政治選擇與其家庭關係不大。他離開北大時甚至都沒有告訴遠在福建老家的父母。一個經歷了十幾年寒窗考入北大的莘莘學子，拋棄就要到手的學位，毅然參加共產黨革命，這個政治抉擇由他自己作出，也有很大風險。這個選擇包含非常複雜的成份，政治理想、前途考量、人身安全等因素交織在一起。和林幾乎同時到華北大學求學的劉煉，也是冒着國民黨封鎖和搜捕的危險，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選擇了「愛國抗日」的共產黨。其選擇不但是政治上對共產黨的認同，也是在嚴酷的環境中謀取個人出路的一種嘗試<sup>②</sup>。

對於置身動盪政局中的年輕人而言，每個人自謀出路的同時，也充滿了命運賭注的無常。建國初期，林宏園參加國民黨和三青團的同學被「鎮壓」，他曾就讀的北大政治學系被取消，當年教導他們的老師在報紙上公開承認自己「替帝國主義和它的走狗完成了一個可恥的任務」，「宣傳了那種英美壟斷資產階級用來欺騙無產階級和殖民地人民的『社會主義』和『世界主義』」<sup>③</sup>。北大政治學系主任錢端升，儘管曾在公開演講中多次直言批評蔣介石，但依然被共產黨內及校內同事看作「壞事有餘，易受利用」，「表現最糟糕的國民黨左翼」<sup>④</sup>，還是不能免於連番的自我批判和檢討<sup>⑤</sup>。與其老師和同學相比，林的政治生活相對平坦。共產黨政權對於政治忠誠的關注似乎遠大於對意識形態純粹性的要求。這意味着，新政權會容忍一個根本不太了解馬克思主義但參加了革命的青年知識份子，卻對和國民黨政權有關的人士充滿了不信任，清理是遲早的事。

### 三 「中間派」：新形勢下的自我改造

本文的第二位訪談對象周康成則是一個被動地介入新時代的知識青年的典型<sup>⑥</sup>。周1925年生於天津一個普通商人家庭，1944年考上了北京大學，在北大大過了最充實快樂的一段求知日子。1949年初，共產黨的部隊進入北平城，二十四歲的周正在北大法學院教書。他有預見地將自己的畢業證書燒為灰燼。許多類似周這樣為國民政府工作過的人，無法像北大校長胡適那樣倉皇南下，不得不留下來應對政治鉅變。周擔心的是其「舊人」身份是否會讓他失去工作。1949年9月16日，《天津日報》刊載社論〈六評白皮書〉，其中有一段為中共中央指示要讓「留用人員」有飯吃<sup>⑦</sup>，他的心才稍微安定。

雖然政府為了穩定人心，試圖穩妥解決留用人員的生存問題，但鋪天蓋地的政治運動很快席捲一切。1949年冬天，北大師生在京郊參加土改，正常的課程都取消了。周康城在京郊北源呆了整整一個冬天，後來他還赴廣西參

加了很久的土改。1950年抗美援朝開始，愛國主義運動轟轟烈烈開展起來，像周這樣的舊人員，為了表示對新政權的支持，不但要在愛國公約簽名，還紛紛把僅有的積蓄都捐獻了出去。談及建國初期的種種審查，周回憶說<sup>②4</sup>：

我們也要寫交代書，把自己的歷史都寫清楚，主要是看有沒有參加過反動組織，像國民黨啊，三青團之類，以前我們班有四十多個人，畢業後有一些人找不到工作，就參加了國民黨，他們比較麻煩。我是一個專門讀書的人，沒參加過甚麼政治組織，也就很容易過關了。

1952年，伴隨着思想改造運動，高校很快開始了院系調整。周康城因為曾經學習過俄語，被分配到剛剛成立不久的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他努力閱讀蘇聯書籍，吸取知識，以適應時代變化<sup>②5</sup>：

法律系也主要是開設蘇聯的課程。但是能真看俄文原著的人很少，懂俄文的人也很少。當時在人民大學有許多蘇聯顧問，除了蘇聯派來的之外，很多都是流亡到東北的白俄羅斯人，他們在俄語系教學生俄語。我們法律系用的是蘇聯教科書，老師和學生都是閱讀俄文原文。我當時讀了很多書，包括蘇聯學者的專著，還有蘇聯法學刊物上最新發表的文章。當時訂閱了一本蘇聯雜誌，叫《國家與法律》，包含很多專業性很強的文章。法學基本東西都沒有變化，和西方的很多東西也沒有特別多區別。民法、合同、所有權、法律行為，這些東西都有。這些都是多少年人類文化共同的遺產。那個時候還在乎一些最基本的知識，大家還在學習，不像後來，政治一搞起來，就甚麼都不要了。

周康城謹慎而小心翼翼地在此時政權下生存着。以前的地下黨組織現在也全都公開了，黨員活動也轉向公開。仿照解放區的編制，學校中的各院系都建立了黨組織，黨員在學校佔有非常特殊的位置。政治身份成為新社會考量的最主要尺規<sup>②6</sup>：

學校有黨委、系裏有總支、教研室有支部。教研室主任一般都是「三八式」，指的是三八年參加革命的，之後的不行，那是竊取革命果實，學校裏的領導都是資歷很深的老同志<sup>②7</sup>。我們法律和外交是一個教研室，住在一起。外交系是重要的系。因為剛建國，外交部門的人才不夠用，國民黨以前的班子徹底不能用，派出去的大使是部隊中的將軍。下面的科長和一般人員，人手不夠，選人來我們這裏學習一年，去外交部工作，選人才很苛刻，政治正確最重要。後來改成了工資制<sup>②8</sup>，我們普通教師，也沒有其他的生活來源，一切都跟着黨走。

在黨的領導下，政治和思想是否符合黨的意識形態要求成為一個重要指標，很多有過「舊社會」背景的中間派知識份子，都需要在新社會改造自己，

以適應新崗位<sup>29</sup>。周康城努力改造自己逐漸接受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信仰共產主義，積極參加政治運動。他小心謹慎地表明「政治正確」的態度，認同現實政權的統治權威，警惕自己不要去做逾越政治紅線的事；而在此掩護下，保留着專業知識和技能的追求，既是明智之舉，也是形勢使然。

#### 四 多元雜陳革命文化影響下的知識份子

新政權需要培養完全忠誠於黨國的人，建設新文化，摒棄資產階級的社會風氣，培養服務於工農大眾的知識份子。早在對國民黨的戰爭全面勝利之前，中共就開始培養接管全國的幹部和人才，1948年6月，延安大學洛川分校開學<sup>30</sup>。1949年後，中共在各地開辦軍政大學、革命大學，培育「革命新人才」的機構如雨後春筍般湧現。

黨國利用手中的權力，指導着輿論的導向，審核每一個人的思想狀況，把握社會思想走向，努力建構社會全新風尚。1957年反右運動之前的七八年間，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機關刊物《中國青年》雜誌組織了一系列關於思想意識問題的討論，這些討論包含了正確原則的指引和對錯誤思想的批判，明確表明了黨建構新的政治文化的決心，也表達了黨對知識青年思想和政治覺悟上的要求（表1）。

表1 《中國青年》組織的政治思想意識討論，1949-1957年

時間	討論問題	結論
1949.7-10	理工科學生和技術人員要學習政治嗎？	自然科學工作者必須學習政治，樹立革命人生觀。
1950.5-7	華北聯大的學生可不可以做收發？	對革命工作的態度是一個基本問題，必須無條件服從組織。
1950.7-11	應該根據甚麼來建立我們的遠大理想？	在本職崗位上踏踏實實地做小螺絲釘與建立遠大理想、做專家是一致的。
1951.10-1952.1	在土地改革運動中鄭輝人應該怎樣對待他的地主家庭？	鬥爭了自己的地主家庭，革命就增加了一分勝利。
1952.2-5	陸尚博的思想有些甚麼問題？	陸尚博想繼承父業當資本家，是資產階級人生觀滲透到了骨髓。
1953.5-9	怎樣才能在事業中發出更大的光和熱？	在平凡的崗位上充分發揮螺絲釘作用就是發出了光和熱。
1954.2-5	甚麼是我們的遠大前途？	個人前途和社會前途密不可分，要將自己的前途和祖國建設的前途聯繫在一起。
1955.3-6	是甚麼阻礙了黃明同志的進步？	是資產階級個人思想阻礙了黃明進步。
1955.8-10	謝力同志的錯誤思想有甚麼危害？	個人主義不但沒有前途，而且容易上反革命的圈套。

1956.1-4	不安心農村工作是否情有可原？	城市比農村好，不是不安心農村工作的理由，而應是努力建設農村使之趕上城市的理由。
1957.2-5	這樣〔為了人民的事業不顧自己個人利益〕是不是傻瓜？	為了人民的事業，革命者就是安於做傻瓜。
1957.8-10	到底應該重用甚麼樣的人？	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才」不能重用。
1957.11-12	知識青年為甚麼要經過勞動鍛煉？	知識青年只有經過勞動鍛煉，才能培養為工農群眾服務的思想感情。

資料來源：參見陳映芳：《在角色與非角色之間——中國的青年文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頁68-69，表2.2。

這些問題討論體現了黨和國家的願望，期待着每一個參加革命的青年，都能摒棄錯誤思想，為工農群眾服務，把個人命運和祖國前途以及無產階級的偉大事業聯繫在一起。但問題是，每個具體的人，在具體情境下參加革命，原因都非常獨特，也千奇百怪，具有個性化色彩。報紙上所寫所號召的那些「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那些千篇一律的「遠大理想」，可能只是名義上的。如果不能耐心傾聽歷史上幾乎要被湮沒的活生生的個體的聲音，幾乎難以發現新政治文化名實之間有時會有很大差距。

本文的第三位訪談對象李昌吉則講述了一個孔孟之道如何融入現代革命的故事。1928年他出生於陝西一個普通農民家庭，從小被過繼給無子的伯父。可是伯父早逝，他獨自一人和伯母一起生活。一直未有改嫁的伯母省吃儉用，給人洗衣做飯供養他讀書。李高中畢業後留在鎮子上教私塾，主要講授儒家經典。1950年抗美援朝時期，他報名參加志願軍，經歷過政治培訓，成為堅定的「無產階級戰士」。但這些經歷對於他早年接受的儒家價值觀和人生觀，好像並無太大影響<sup>③</sup>：

我從小是讀儒家經典長大的，熟悉孔孟之道，講究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講究孟子的正心誠意。我參加了志願軍，離開家鄉先去了山東，專門去曲阜拜了孔廟，我從小唸書唸孔孟之道，這是第一次有機會去孔子故鄉，在曲阜孔廟我很激動，實現了我過去多年的理想。我去抗美援朝戰場上，我們家就再也不會被人看不起了，參加革命，多光榮啊，守寡多年的母親也覺得臉上有光彩。

革命文化的宣傳和教導，可能僅僅停留在意識的最表層，那打底的儒家倫理似乎並未改變多少。

也有其他知識青年成為革命先鋒，但其理由也是和革命理想風馬牛不相及的。本文的第四位訪談對象王德軍的經歷，使我們看到新時代政治文化環境下舊有的「三民主義」價值觀生存的可能性。王年輕時研習三民主義理論頗有心得，建國初期認定共產黨是孫中山三民主義的實踐者，因此參加了抗美援朝，覺得這是一個保衛中華民族，維護民族獨立的偉大戰鬥<sup>④</sup>：



我年輕時候特別崇拜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覺得只有三民主義才能救中國。蔣介石政府貪污腐敗，沒有繼承孫中山的遺志。我認為毛澤東和共產黨是能實現三民主義的，所以參加共產黨的戰鬥。

第五位訪談對象蔡恩勝則講述了一個如何利用新社會身份為自己謀利的故事。他參加軍政大學，是因為其父賭博把財產輸光，他必須找個謀生的好出路<sup>③</sup>：

我想參加軍政大學可以分配個好工作，我也不懂甚麼主義，雖然整天學習開會，也搞不懂那些道理，甚麼理想，混日子唄，很多人跟我差不多，大家都是謀個差事。畢業後很多同學都分配得不錯，警察局、軍隊、工廠、機關，都有去的，有的後來還當了他們部門的領導，待遇也很好。

這些青年可能只是千軍萬馬中的少數，但他們的存在則展示着新的政治文化更真實的一面——其內在的衝突和張力。他們雖然名義上被收編入各種國家機構，被認為青年革命者，成為這個政權最堪信任的生力軍；靠着「工農知識份子」的名號，他們可以獲得體制中穩定的身份，在革命中國更暢通無阻地活下去，並獲得種種現實的好處，但是，黨號召的崇高精神，似乎並未在他們生命中佔據一個重要的位置，而且很多人還能幸運地將舊思想和新身份和諧相處，在舊瓶中裝新酒。

現代中國曾經歷過多次權勢轉移，在此過程中，人們為了生存而投附於不同的主義和政治團體，原本並不是新鮮事。辛亥革命之後，國民黨對各色投機份子的巨大吸引力，可以從同盟會元老居正的描述中略見一二：「自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同盟會的聲光確是一躍千丈」，「自南都建立，一日附者率數千」；「然以現勢權位之所在，投機份子，紛紛入會，同盟會固有之純潔性質，已漸變而近於複雜之途」<sup>④</sup>。革命精神遂在權勢爭奪中逐漸喪失原有的純潔性，這樣的悲劇在現代中國一再上演。共產黨政權無法改變此種規律，但其意識形態卻過份強烈地要求個體德性的高尚，政治的理想主義和現實功利之間的緊張與矛盾構成了這個政權最基本的悖論。久而久之，可能的結果會是「青年人覺得他們被逼上了一個舞台，必須時刻不停進行表演」<sup>⑤</sup>。

## 五 政黨倫理與功利主義

本小節試圖以文本材料佐證田野訪談，選取建國初期著名知識份子的個案，特別描繪了著名作家宋雲彬、學者顧頡剛和陳寅恪的政治境況和心靈世界，配合訪談材料，相互參照分析，藉以說明此一時代的意識形態的複雜性和內在獨特的政治文化氛圍。

新政權建立之後，很多人都明白環境變化，只有順應政治規則的要求，才能更好地生存下去。新政權的指導思想已經確立，人們表現得「很革命」，

有時候可能是為了獲取權勢地位的交易券，或者僅僅為了保護自己。宋雲彬的日記《紅塵冷眼》不但記載了當時的政治社會變遷，也描述了這一變革時期知識份子的心路歷程。1949年9月28日，宋的日記中有如下記載<sup>⑥</sup>：

沈老〔沈鈞儒，號衡山，宋雲彬稱其為衡老〕報告中央政府委員及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名單協商情形。史良兩個委員會內均無其名，大為不平；實則已內定任彼為司法部長，被選為委員與否，無關宏旨也。沈志遠、千家駒等聆衡老報告，政協全國委員會預擬定名單中有丁西林、竺可楨，大不謂然，以為彼等平時不談唯物辯證法，有何資格當選。

這則日記透露了人們之間的全新關係。在知識界內部競爭性關係裏，政治水平和馬列主義修養，成了最重要的衡量尺規。政協委員既然是一種榮譽和高貴的身份，自然應該是主流文化的象徵。如果不能很好談論唯物辯證法或馬克思主義，定然會遭到同行詬病，更不用說遭到政府敵視和懷疑。

不止如此，人們還要理所當然地時刻檢視自己內心、行為和思想是否符合政治要求。如宋雲彬1951年6月28日的日記所記載<sup>⑦</sup>：

今晨葉師母〔葉聖陶夫人〕問余杭州開會預備去否，余謂天太熱，決定不去。葉師母謂欲去亦不可能，因臨時學習正在進行中也。余曰：「我要去就去，為甚麼不可能？」後經反省，此種論調，實唯一典型的自由主義者。下午與聖陶等通車回寓，途中曉先〔葉聖陶同事〕談讀毛主席《反對自由主義》一文之感想，聖陶忽謂余曰：「兄今天早上的談話，實為典型的自由主義者。」余大慚。

人們通過自我監督和自我反省，逐漸靠攏主流政治文化，按照其標準行動和思考，官方的政治倫理已經深入個人的生活之中。一種全新政治倫理逐漸確立，那些有幸成為意識形態代言人的，則會獲得相應的權勢和地位，而那些無法融入或疏離這種新倫理的個體和群體，則會被時代拋棄和淘汰。

對於所有知識份子來說，政治見解、個人思想與權力鬥爭交織在一起。正如戴晴指出，建國初期，共產黨給了中國民主同盟十八個新政協的代表名額，提名權控制在組織部長章伯鈞手中，論功行賞在即，民盟裏邊的派系紛爭，從原本正當與正常的政治見解切磋，滑落到下流的人事糾葛之中<sup>⑧</sup>。政治見解不再僅僅是私人理念，而逐漸演化成人們爭權奪利、彼此攻擊的武器。1950年1月31日，顧頡剛在其日記中記載，他接到多年來好友丁山傾訴其苦楚的來信<sup>⑨</sup>：

惟兄知弟埋頭故紙，向不參加政治活動也，解放後，初詆弟為青年黨，即辱弟為法西斯，蜚語相傷，毒於蜂螫。弟撫躬自問，愛國情緒，不敢後人，救世有志，心餘力絀，不意鼎革以還，吹毛求疵者有人，均抹煞弟亦嘗營救共產黨黨員若干人也。

此時，顧頡剛正為丁山的工作事宜奔走，但因為種種「歷史原因」，昔日故友在新政權下度日維艱。丁山也在信中傾訴了他的憤懣之感：「昔日是非，決於今日政治手段，我輩書生，自甘落伍而已！」<sup>④</sup>對於政治氣候的變化，顧與丁感同身受，自然無需多言。

組織機構上的興衰以及人事上的更替，讓人們都希望能在新博弈規則下獲勝。如果競爭自然公平，大部分勝出者皆德、能優秀的人；但在一種扭曲的政治文化中，事情總會發生微妙的變化。對此，顧頡剛的感知不可謂不敏銳，1950年7月10日，他的日記給我們一個鮮活的佐證：「中國科學院中，鄭振鐸任考古研究所所長，羅常培任語言歷史研究所所長。去年予到北京，晤王日蔚君，渠云：從此教育界上不再有鈎心鬥角事矣！哪知到了今日，偏是這輩會鈎心鬥角者得意。」<sup>⑤</sup>

明晰如顧頡剛者，自然可以在紛亂中洞悉到現實的荒唐，「鈎心鬥角」和「欺詐」的毒素，已經一點點侵蝕了中國社會的肌體，從上層到基層，從有名望的知識份子到在校普通青年學生，無不受到這種氛圍的影響。一旦某一種意識形態成為國家政權的指導思想，那就不再單純是個人精神世界的自由選擇，而包含現實功利和利益的考量。

本文的第六位訪談對象程遠新曾是共產黨的地下工作者，而在新時代也深刻體會到社會氛圍的變化，他對此時政治文化中濃厚的功利主義有很深的印象和感受<sup>⑥</sup>：

我是中學的時候就參加地下工作，相信黨宣傳的自由民主理想，信仰共產主義。我中學參加重慶的地下黨報紙刊印，還被國民黨列上黑名單，如果不是48年逃到北京，可能就被國民黨逮捕了。解放後，我父親和哥哥去了台灣，我自己相信共產黨能實現民主自由的政治理想就留下了。但那時候北京大學校園卻出現了一些讓人感覺不太舒服的事情。很多人看到革命勝利了，中共執掌了政權，就削尖了頭向組織裏面鑽，想方設法成為團員或者黨員，我覺得他們也不是真的有甚麼信仰，但是還採取了一些很卑鄙的手段，藉這樣的身分謀取利益。他們都非常投機，很多小事情上斤斤計較，虛偽奸詐，覺得和這些人根本合不來，所以就退了團，不想和他們同流合污，自己鑽研物理學了。

1949年，陳寅恪看到知識份子為求生存，竟完全置廉恥氣節於不顧，而一味取媚於新政權，遂寫下一首《男旦》：「改男造女態全新，鞫部精華舊絕倫。泰西風流衰歇後，傳薪翻是讀書人。」<sup>⑦</sup>1951年，當他聽說「琉璃廠書肆之業舊書者悉改新書」，也只能感慨「舉國沉醉」而已：「迂叟當年感慨深，貞元醉漢托微吟。而今舉國皆沉醉，何處千秋翰墨林。」<sup>⑧</sup>1952年，嶺南大學校園充斥着控訴的聲音，學生在美國人住宅前集會示威。是年8月，嶺南教師進行思想改造，人人過關。9月9日，陳寅恪多年的朋友嶺南校長陳序經在全校師生面前作了四個鐘頭的「自我檢查」，儘管講到動情處熱淚縱橫，但仍不獲通過，隨後全校師生向校長展開了激烈批判<sup>⑨</sup>。

1949年之後的中國社會，政治鬥爭和思想審查日漸深入，國家對個人精神世界的控制也愈加嚴峻，人們互相檢舉揭發，人心涼薄至極。建國初期陳寅恪的心境和他對時代道德文化氛圍變遷的深刻體驗，也許在他1950年正式出版的《元白詩箋證稿》中得到了最完整的表達<sup>⑥</sup>：

縱覽史乘，凡士大夫階級之轉移升降，往往與道德標準及社會風習之變遷有關。當其新舊坳壇之間際，常呈一紛紜綜錯之情態，即新道德標準與舊道德標準，新社會風習與舊社會風習並存雜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誠亦事實之無可如何者。雖然，值此道德標準社會風習紛亂變異之時，此轉移升降之士大夫階級之人，有賢不肖拙巧之分別，而其賢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終於消滅而後已。其不肖者巧者，則多享受歡樂，往往富貴榮顯，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於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兩種以上不同之標準及習俗，以應付此環境而已。

新中國確定了新的思想標準和道德標準，馬克思主義成為官方欽定的政治倫理<sup>⑦</sup>。政治權力和思想、主義交織在一起，構建了一個非常獨特的景觀。誠如社會學學者應星所指出的，國家鼓勵個人對政黨倫理的自覺奉獻，但由於這種奉獻與變換不定的評判標準和充滿彈性的獎懲機制是緊密相連的，結果，它在日常的實踐中就刺激了人的私欲的增長（包括榮譽感的膨脹），鼓勵人對權力的精心算計，使人們所追求的只是馴服行為的可見性以及可積累性，而真實的內心世界則在這種計算和追求中被掩飾起來<sup>⑧</sup>。如果新時代要求人們應付變局，利用浮游在表面的革命話語尋求生存的資本；如果圓滑世故和機巧偽善能成為一種生存法則，那麼人們怎麼去辨認真實的心聲和嘈雜的表演，區分真誠的信念和戴面具的秀場？更重要的是，一種宣揚大公無私的信仰和崇高理想的主義，卻在政治文化傳播實踐過程中，發生了戲劇般的逆轉，權力爭奪和派系鬥爭、生存競爭和自我保全複雜地糾纏在一起。只有深刻體悟這些，人們才能獲得更真實的政治圖景。

## 六 討論：知識份子與現實的功利世故

1949年政權轉移前後的知識份子有左、中、右的區分<sup>⑨</sup>，而從「左翼」到「右翼」之間，是一個廣泛的光譜，包含着幾乎無限的可能性。他們的思想情感、選擇和行為，一定要安置在一個複雜激盪的歷史背景中才能更好理解。本文並不是對知識份子作全景式描繪，而是通過深入訪談，對照文本史料，展示為人所忽視的時代知識份子文化的特色。

美國學者湯森（James R. Townsend）等人指出，新中國帶來了嶄新問題，不只是將合法性轉移到一個新政權手中，而是創造一個新的政治共同體，其中所有的個人都將改造自己公共生活的形象，以及自己在其中擔任角色的形象<sup>⑩</sup>。每個人要面臨的不僅是個人的信仰和理想選擇，同時也是公共舞台上

的身份和形象。新中國逐漸建構了這樣一種政治文化氛圍，社會成員或者各階級和階層群體的成員，必須以符合社會制度所要求的方式來行動。知識份子是一種文化氛圍的重要構建者，是革命劇場的一部分，他們必須計算自己行為的風險和收益，根據政治氣候對行為作出適當調試。這種調試不但包含着理想主義的成份，也夾雜了精深的功利計算和考慮。

從上述的例子可見，在1949年前，不少知識份子可能因為對國民黨的失望，懷着民主自由渴望而投奔解放區。新政權建立之後，他們順應政治形勢而努力學習並使用意識形態的新辭藻，並為了生存而掩飾自己內心的傾向和想法。他們當中的相當一部分人，也可能憑藉權力重組的機遇，從底層社會的民間精英躍升成為新時代的主人翁。他們的抉擇構成了新政權的重要基礎，也是新政治文化的重要承載者。黨號召人們建立革命的覺悟和信仰，但是我們依然可以看到形形色色駁雜的現實，民主自由、明哲保身、名利思想、儒家倫理、混日子、虛偽表演等等，五花八門地陳列在一起。這些複雜因素構成了新政治文化的內核，也侵蝕了其理想中的純潔性。

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中曾對中華帝國的士大夫文化有過生動的描述。如明朝首輔申時行這樣的君子，儘管強調正心誠意，但是對理想和事實的脫節，卻有一番深切的認識。他把人們口頭上的理想稱為「陽」，而把人們不能告人的私欲稱為「陰」。調和陰陽是一件複雜的工作，他所期望的不外是「不肖者猶知忌憚，而賢者有所依歸」<sup>⑤</sup>。傳統儒家雖然強調道德教化，但承認每一個人在不損於他人的情況下都有追尋自己功利目標的權利。也正因為這種彈性，申時行才可以心安理得地說，儒家的倫理道德可能是一種理想和裝飾，但理想和裝飾究竟不同於虛偽，一個人仍以此為起點推行他的誠意<sup>⑥</sup>。

當代中國希圖建立一種高尚的政治文化，培育道德上無私奉獻的人。但此種高尚道德的教育與政治權力的運作結合緊密，馬列主義或毛澤東思想就不再是私人理想，而是權力、地位和利益分配的一項重要衡量指標。由此，倫理也就成為市場中流通的貨幣。應星指出，在一個具有準宗教性的價值理性（政黨倫理）與世俗性的國家權力緊密結合在一起的社會中，在各種程序技術與單一的抽象價值結合在一起的時候，往往造就出來的是一大批在追求個人目標上不擇手段、內心不受任何規範，既無真正的信念又不講任何責任的虛無主義者<sup>⑦</sup>。新政治文化真正的危機可能正在於此，過份強調政治倫理，試圖完全消滅人的私欲，但實際上卻構建了一個權力、政治理想、現實功利緊密結合在一起的體制。士大夫文化中原有的一點點彈性也不復存在了，政治理想主義便容易變成空中樓閣和純粹的裝飾，因為只有深諳主義的表演，善於利用意識形態符號來謀取權力和利益的人，才能獲得更好的報償。

1978年，革命中國經歷了三十年鬥爭後，北京地下詩歌團體出版了文學刊物《今天》，其中有一首名為《回答》的詩歌傳唱大江南北，影響了一代青年人，裏面有這樣的詩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看看吧，在那鍍金的天空中，/飄滿了死者彎曲的倒影。」<sup>⑧</sup>這首詩的作者就是著名詩人北島，他用一種充滿象徵意味的詩句，宣洩出人們對那個荒誕時代的直接觀感，和三十年前的前輩陳寅恪遙相應和。當人們起身為一個時代默哀

的時候，卻似乎忽略了這樣一個問題：歷史是否還間接地存在於當下？如果是，那麼以甚麼方式存在於當下？當我們觀看當下中國社會明顯的犬儒化，特別是知識階層的犬儒化，是否更應該追本溯源回顧二十世紀中國究竟發生了甚麼，導致了今天的結果。這也是研究歷史給當下生活帶來的一點啟迪。

### 註釋

① Merle Goldman and Timothy Cheek, "Introduction: Uncertain Change", in *China's Intellectuals and the State: In Search of a New Relationship*, ed. Merle Goldman, Timothy Cheek, and Carol Lee Hamrin (Cambridge, MA: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7), 1-3.

② Carol Lee Hamrin and Timothy Cheek, eds., *China's Establishment Intellectuals* (Armonk, NY: M. E. Sharpe, 1986), 5-10.

③ Eddy U, *Disorganizing China: Counter-bureaucracy and the Decline of Socialism*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56-59.

④ 參見謝泳：《逝去的年代——中國自由知識份子的命運》（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9）、《教授當年》（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0）；陳徒手：《人有病，天知否：一九四九年後中國文壇紀實》（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于風政：《改造：1949-1957年的知識份子》（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傅國湧：《1949年：中國知識份子的私人記錄》（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5）；許紀霖：《大時代中的知識人》（北京：中華書局，2007）；楊奎松：《忍不住的「關懷」：1949年前後的書生與政治》（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

⑤ 斯通(Lawrence Stone)著，古偉瀛譯：〈歷史敘述的復興：對一種新的老歷史的反省〉，載陳恒、耿相新主編：《新史學》，第四輯，〈新文化史〉（鄭州：大象出版社，2005），頁22。

⑥ Pierre Bourdieu et al., *The Weight of the World: Social Suffering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trans. Priscilla P. Ferguson et al. (Oxford: Polity Press, 1999).

⑦ 林宏園的訪談，北京，2008年10月24日。本文六位訪談人物皆為化名。

⑧⑨⑩⑪⑫ 林宏園的訪談。

⑬⑭ 胡素珊(Suzanne Pepper)著，王海良等譯：《中國的內戰——1945-1949年的政治鬥爭》（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頁63-68；73。

⑮ 時任國民黨中央黨史編纂委員會副主任羅家倫在1947年1月2日的日記中感慨：「今日中大學生等遊行，為反對美軍二人在北平姦污女生事。此等事本係個人行為，可以軍法解決，乃強做成國際政治問題，蓋與共產黨發動之反美運動連成一片也。」參見羅家倫：〈羅家倫先生日記〉，《近代中國》（台北），1996年第131號，頁148。據舒蕪回憶，他的一個堂弟方復，抗戰期間入西南聯大，抗戰後讀清華大學建築系，為中共地下黨員，是「沈崇事件」時發起推動北京學生抗暴大遊行的幾個決策人之一。轉引自謝泳：《教授當年》，頁68。

⑯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下冊（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1），頁463。

⑰ 韓丁以山西土地改革為藍本寫出了著名的作品《翻身》，參見William Hinton, *Fanshen: A Documentary of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 (New York: Vintage, 1966)。

⑱ 劉煉：《風雨伴君行——我與何干之的二十年》（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8），頁3-5。

⑲ 龔祥瑞：〈徹底清算北京大學政治學系的教學思想〉，載《光明日報》社編：《思想改造文選》，第二集（北京：光明日報社，1952），頁13。

⑳ 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頁436。

㉑ 錢端升：〈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務祖國而學習〉，載《光明日報》社編：《思想改造文選》，第一集（北京：光明日報社，1951），頁48-53。

- ⑳ 周康城的訪談，北京，2008年11月29日。筆者曾對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多位老教師訪談，其中多位與周康城經歷類似，此處以周為典型代表。
- ㉑ 參見〈中央關於對舊人員處理問題的電報〉，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頁115-16。
- ㉒⑳㉑ 周康城的訪談。
- ㉒ 不但學校當中重用的領導和模範人物是這些「三八式」，魏斐德指出，在上海被留用下來的原國民黨警察學習的共產黨模範幹部往往是山東原籍人，其中許多人是在1938年參加革命的，且曾經扛過「三八式」長槍，被上海人稱為「三八式」幹部。參見魏斐德（Frederic E. Wakeman）著，梁禾譯：《紅星照耀上海城——共產黨對市警察的改造（1942-1952）》（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頁107-108。
- ㉓ 關於建國初期知識份子工資制，參見馬嘶：《百年冷暖：20世紀中國知識份子生活狀況》（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頁341-42。
- ㉔ 例如私營報刊的從業人員都進行了改造。參見張濟順：〈從民辦到黨管：上海私營報業體制變革中的思想改造運動——以文匯報為中心案例的考察〉，載華東師範大學中國當代史研究中心編：《中國當代史研究》，第一輯（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頁40-75。
- ㉕ 〈半數學生來自蔣管區，熱心研讀毛主席著作〉，《人民日報》，1948年6月25日。
- ㉖ 李昌吉的訪談，陝西，2011年8月5日。
- ㉗ 王德軍的訪談，湖北，2011年8月20日。
- ㉘ 蔡恩勝的訪談，陝西，2011年7月23日。
- ㉙㉚ 戴晴：《在如來佛掌中——張東蓀和他的時代》（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頁128；86。
- ㉛ 阿尼達·陳（陳佩華）著，史繼平、田曉菲、穆建新譯：《毛主席的孩子們：紅衛兵一代的成長與經歷》（天津：渤海灣出版公司，1988），頁83。
- ㉜㉝ 宋雲彬：《紅塵冷眼》（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頁169；238。
- ㉞㉟㊱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六卷（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頁585；585；657-58。
- ㊲ 程遠新的訪談，北京，2008年11月7日。
- ㊳㊴ 參見余英時：《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兼論他的學術精神和晚年心境》（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4），頁65；58。
- ㊵ 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北京：三聯書店，1995），頁53-54。
- ㊶ 轉引自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頁49-50。
- ㊷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就已經指出，人民政府應有計劃有步驟地改革舊的教育制度、教育內容和教學法；給青年知識份子和舊知識份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確定馬列主義指導思想。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一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頁11。另參見周恩來：〈關於知識份子的改造問題〉（1951年9月29日），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二冊，頁439-52。
- ㊸㊹ 魏沂（應星）：〈中國新德治論析——改革前中國道德化政治的歷史反思〉，《戰略與管理》，2001年第2期，頁33；38。
- ㊺ 本文描述的對象中沒有完全「右」的知識份子，只是程遠新有一些「右」的傾向。
- ㊻ 湯森（James R. Townsend）、沃馬克（Brantly Womack）著，顧速、董方譯：《中國政治》（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頁137。
- ㊼㊽ 黃仁宇：《萬曆十五年》（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47-48；50。
- ㊾ 參見北島：〈回答〉，《詩刊》，1979年第3期，頁46。